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起步——《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与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上）

王海光

摘要：本文用政治文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以《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文本（1958年稿本、1965年稿本、1975年稿本）为基本史料，梳理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演变和经典化的过程，考察了其文本流变与“反冒进”、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革运动的历史语境关系，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误读误解的问题。以期通过“以苏为鉴”和以苏为师、“多快好省”和综合平衡、“重轻农”和“农轻重”、革命和生产等矛盾问题的分析，探讨其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的内在冲突，呈现一个认识毛时代工业化道路的文本视角。¹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反冒进；大跃进；毛泽东著作经典化；中国工业化道路

作者介绍：王海光，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旋转的历史》（1995年出版）；《从革命到改革》（2000年出版）；《林彪事件》（2012年出版）。邮箱：wanghaiguang@sina.com

Title: The Proposal of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ra of Mao Zedong – Canonization of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o Zedong’s Era (Part One)

1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将分为上、中、下三篇依次发表。

Abstract: With political textual analysi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uses thre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1958, 1965 and 1975) from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s raw data for the study. In addition to sorting out the processes of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will als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deformation with "Anti-rash Advance", "Great Leap Forward", 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campaign. This is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that have existed persistent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tradictory issues in the principles "Take Soviet Union as a mirror" and "Take Soviet Union as a teacher"; socialism "More, Faster, Better and Cheaper" and "Comprehensive Equilibrium"; economic policies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heavy industry";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internal conflict betwee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olicy practice of those issues, presenting a textual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journe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Mao's era.

Keywords: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ti-rash Advance, Great Leap Forward, canonization of Mao Zedong's works, the journe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之后，在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首次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做了《论十大关系》报告。作为毛泽东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大陆官方的历史定位中，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³。

然而，让人们深感不解的是，这篇素负盛名的标新立异著作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而是由他的政治继承人华国锋公布于世的。以《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全文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最终完成了它的经典化过程。此时，离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首次提出《论十大关系》，已有整整20年时间了。这个公开发表的官方权威文本，经过了多次整理、编辑，有删节，有增补，有修改，与毛泽东最初讲话的原始文稿已有了很大不同。

毛泽东重要著作的整理和发表，是国家政治活动的大事情，有其特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作为毛时代同等分量的两部著作，《论十大关系》讲话在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简称《正处》）讲话在后，在理论上是一个前后承继关系。但是，《正处》很快就整理公开发表了，而《论十大关系》虽然整理多次，但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同意公开发表。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使然。《正处》很快修改发表，是反右派运动的现实需要，制造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历时长、变动大、面世晚，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一波三折曲折发展的历史写照。

对于《论十大关系》名声在外而又长期“待字闺中”的漫长经典化过程，坊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褒贬评价。褒评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期望很高，力求搞出一个尽美尽善的版本，所以临终也未尽其稿；贬评说：这是由于毛泽东文过饰非的特点，总是要以现行政策修改历史文献，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文本。这两种看法的根本分歧，首先是在对它的文本性质的不同认识上。理论经典的宣传学习，政策指导文件的贯彻落实，历史文献的研究分析，其不同的文本性质决定了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认知的差异性是很大的。

《论十大关系》在经典化前后，文本性质是不一样的。在经典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74、275页。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80页。

化之前，《论十大关系》是作为中共进行经济建设的政策指导性文件，只是在党内流传，并随着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改，先后形成了三个文稿；在经典化之后，《论十大关系》是作为毛泽东一项重要的思想遗产，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具有崇高地位。《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热潮。

《论十大关系》的研究工作真正开展起来，是在经典化以后的事情。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论十大关系》做出了官方权威的历史定位。在起草“决议”时，邓小平定调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好的。⁴《历史决议》评价《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列为“集中体现”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的五篇重要著作之一，对阐述的笔墨最多。从而设定了中共在宣传和研究《论十大关系》上的政治框架。

《论十大关系》的研究有很强的政治性，热冷程度往往反映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动向。在《知网》上检索“论十大关系”的词频，经典化前共有60多条，集中在大跃进的三年。经典化后，在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了两个宣传研究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华国锋时期，反映了“抓纲治国”的政治动向。1977年全年仅《人民日报》出现《论十大关系》的词频就有406次。1980年代的研究比较平稳，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动向。第二个高峰期是1990年初，发表数量多，持续时间长，还有官方组织的专题活动。⁵这反映了“六四”后的“反和平演变”语境下，大陆出现的重新肯定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宣教动向。

4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58-259页。

5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为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举办的学术讨论会，还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

在《知网》上用主题词“十大关系”⁶检索，通过词频出现的数量变化反映其传播过程。见下表：



《论十大关系》是学界的一门显学，多年来各种有关著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真正有学术质量的研究乏善可陈，需要进行研究范式的转变。从研究范式上讲，有关《论十大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宣教史学与历史研究两类。宣教史学的研究范式是搞政治教育宣传，以学习体会和阐发意义为文体形式，为历史文献贴上与时俱进的标签，牵强附会地与当前政策联系起来，以需要注解历史，用历史服务现实，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诠释学。政策诠释学是传统经学的现代变种，一种没有知识含量的文字游戏，在意识形态国家最为流行。政策诠释学的文本解读，是把现行政策需要附会在历史文本上，把前代领导人当年的政策言论无限延伸，脱离时代语境地与后来领导人的政策言论联系起来，做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文体形式是用语夸张，联想丰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无限拔高。这实际上是把学术研究搞成了一种微言大义的经典注解活动。具体到《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上，就是宣教史学的标签化、符号化和经学化了，走入了一个假大空虚的死胡同。

开展《论十大关系》的学术研究，从“政治正确”的经学研究转到“事实准确”的史学研究上来，从实证研究做起，寻根溯源，

6 因为文革前讲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大都没有加书名号，所以用“十大关系”的查询，比较适当。其中也有少量不是讲《论十大关系》的词频，但对大数据的统计并不产生影响。

剖玄析微，恢复本来面目。

在《论十大关系》的史学研究方面，学界已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文献版的毛泽东传记年谱的出版，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部史料。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对毛泽东的研究⁷，也提供了来自国外的一些史料。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的解密档案⁸，扩展了研究史源，提供了中外互证的对比性。从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文本的产生与传播做精细化的史学研究。⁹但这些研究还是很初步的，所用史料单一，基本就是文献版的领袖谱传。多数研究者依据的《论十大关系》文本，也只有1965年版本和1976年版本，不太知道还有一个最接近毛泽东讲话原稿的1958年版本。这就造成了论证过程的缺环，简化了许多历史的复杂因素，带来了一些误识、误读、误判、误解的问题。

从整体而言，《论十大关系》的实证研究还很薄弱。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比较缺乏追根溯源的文本学研究。对其从原始文本的形成、流变，到正式发表的经典化过程，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历史分析和不同时代语境的分析；二是比较缺乏对中国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的背景性研究。对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理论实践和重大挫折原因的分析研究比较粗略，没有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多义性与党内高层在工业化路线上的认识分歧联系起来，不能解释毛泽东的思想反复以及在发表两篇文章上的不同态度。

实现《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从“政治正确”到“事实准确”的学术转型，关键是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由于《论十大关系》原始文本等许多文献资料至今没有公开，只有一些特殊学者才能窥见全貌，所以长期悬置了一些问题。诸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

7 近期比较有影响的是，【俄】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大陆版是卿文辉、崔海智、周益跃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8 关于俄罗斯解密档案史料系列，最具系统性和权威性的是由沈志华主编的《俄国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出版。

9 在实证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邱巍的《〈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见《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该文的价值是注意到了毛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即兴和仓促”的或然性特点。

出了统筹兼顾思想，并成为了中共八大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但为什么不久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标榜甚高，认为“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但为什么在生前一直没有同意发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所谓“以苏为鉴”，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有什么关系？《论十大关系》的主题，是多快好省的大干快上，还是综合平衡的协调发展？《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与党内高层的认识分歧，与“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运动有什么关系？等等，不一而论。

宣教史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多是“毛泽东自己背离了自己的正确思想”，“探索的历史局限性”之类的空泛话语。这无疑是没有解释力。人类所有的历史，都是探索未来的实践，都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活动。历史研究的学术工作，是要揭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主观作为及其客观后果的关系，也就是“探索局限性”的工作。在这里，“背离论”、“局限论”这些政治正确的诸说，与其说是对问题的解释，不如说是对问题的搪塞。

本文试图以政治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把《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形成、演变和经典化过程，放置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一波三折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期对上述问题得出一些基于实证研究的认识。根据时段和问题，本文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起步；中篇论述《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过程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曲折发展，下篇论述《论十大关系》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工业化战略转轨，考察毛时代工业化的遗产问题。

一、“以苏为鉴”与“以苏为师”

毛泽东给《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定位，是他在1960年6月《十年总结》中讲的：前八年是仿照苏联模式，从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又讲《论十大关系》“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然后又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¹⁰。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成为以后论述《论十大关

10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3页。

系》的“以苏为鉴”论。但从历史上看，这个“以苏为鉴”的具体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包括毛泽东自己的思想言论，前后也是变化很大的。有时是“为鉴”，有时是“为师”；有时是批斯大林错误的“为鉴”，有时是批赫鲁晓夫错误的“为鉴”。尽管“为鉴”的内容和对象时有所变，但都是对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做出的直接或间接反映，是中共对社会主义改革潮流初起时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与政策选择。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集中了43天的时间，系统听取了国务院各部委和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期间，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掀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暴露出了苏联搞社会主义中的许多负面问题。各部委汇报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国在工业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错误所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具有相互参照的对比性，构成了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条线索。这是毛泽东形成和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¹¹同样，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十大关系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然而，中苏两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客观上存在着先行后随的时空落差。斯大林模式是国际共运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也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和目标。中共执政后全面移植斯大林模式，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明天”。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积累了大量国际国内的问题，对其体制弊害有切肤之痛。在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开始着手纠正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调整国内外政策，政治上加强民主，经济上注重民生，外交上强调缓和。这个政策性改变，集中体现在苏共二十大的政策路线上。而当苏共开始检讨和纠正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错误时，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还在进行时中，刚刚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正在筹谋如何加快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和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给中共高层思考如何又多又

1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快又好又省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启示。最大启示就是不能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的“克隆”了。犹如后行者正沿着前边路标满头大汗地赶路时，前面划的路标却分叉了，这就给了后行者更多的选择性。中国可以反省自己在移植斯大林模式中的种种问题了。从苏共二十大带来的启示意义上讲，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既是“以苏为鉴”的，也是“以苏为师”的。

但无论“为鉴”，还是“为师”，核心点都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体制的社会主义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中苏两党的认识有着很大的落差。对于苏联所经受的斯大林体制的弊害，中国人还没有感同身受的切身体会。这种认知差异的发展，不仅导致了中苏两党以后的分歧，而且也让中共又重蹈了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走得更远。中共提出了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并因大跃进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这段从“以苏为鉴”到“以苏为敌”的历史翻转之变，起始点就是《论十大关系》。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问题意识所在，中苏两党分道扬镳的最初起点应该设在哪儿？苏共二十大与《论十大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关键是应如何理解毛泽东说的“以苏为鉴”？

“以苏为鉴”是《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里既有毛泽东对斯大林体制基本面的坚持，又有中国经验的创造性发挥，内容重点前后不一，是一个行走中的动态概念。而最初的提出，无疑是来自苏共二十大的启示。

在国际共运中，苏共二十大是首先鸣响了社会主义改革号角的标志，揭露了斯大林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¹²，揭露了斯大林肃反和大清洗的罪行，迫害其他民族的罪行，卫国战争的指挥失当，经济政策的严重错误和对待南斯拉夫问题的错误行为，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对外关系上，改变了僵硬的冷战对抗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对外方针；在经济上，改变了片面追求重工业忽视农业的经济政策，通过了苏

12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转载《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49-808页。

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提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经济方针。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方针，与中国在移植苏联模式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相互对照，构成了毛泽东开始“以苏为鉴”思考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在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间，先后听取了35个部委轮流汇报的活动。基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政治话语逻辑，他把这次集中听汇报的工作性质定位为“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¹³这只是讲了《论十大关系》形成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的影响。

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颠覆了斯大林迷信的神话。会后，苏共给中共中央送了“秘密报告”文本。3月3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听取了邓小平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汇报。3月1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此时，他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研究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问题上，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表态的问题，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表态文章。

中共高层虽然对苏共在斯大林去世后的非斯大林化动向有所察觉，但真正意识到这是重大的政治变化，则是苏共二十大。2月20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人，曾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苏共二十大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对苏共重新评估斯大林时代表示了担忧。¹⁴但对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揭露出了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中共领导人感到了巨大震惊。毛泽东评论说，这是“揭了盖子，捅了娄子”¹⁵。事实上，“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问题严重性的揭露还远远不够。但是，它一把撕下了斯大林体制的华丽外衣，让世界一下子看到了铁幕背后的黑暗，这种颠覆信念的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83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535页。

15 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震动是异乎寻常的。在这个“秘密报告”给各国共产党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波中，中共第一时间的最初反映恰恰是最具理性的。当时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些许微词，包括“捅娄子”等言论，主要是指策略方法的不当。对“揭盖子”本身不仅赞同和支持，而且还为搬掉了长期压在头上的大石头感到了兴奋，不需要听从斯大林的指挥棒，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路线了。他称赞赫鲁晓夫很勇敢，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要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¹⁶

为了表明中共的立场，同时也为赫鲁晓夫补“娄子”。中共中央在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这篇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多遍的重头文章，表达了中共支持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态度，但对斯大林持“三七开”的评价，称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对外和平共处、对内发展民主和加强农业注重民生的经济政策，中共都是高度赞同的。只是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因为事关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毛泽东表示了保留意见。¹⁷

“一论”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而中共是可以避免发生斯大林错误的。一是中共有一套“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能够抵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二是中共有破除教条主义的历史经验，过去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现在搞建设仍然必要发扬。¹⁸“一论”对“以苏为鉴”的初步总结，即群众路线与反教条主义，对《论十大关系》的思路形成有着直接影响。4月4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定稿会上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557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545页。

18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¹⁹

以3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为界，毛泽东听各部委汇报的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集中听汇报阶段。主要是工业部门的汇报，首先汇报的是重工业部门。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发展速度的问题。后期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路形成阶段，听汇报与讨论苏共二十大交叉进行。所谓“以苏为鉴”，开始总结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时间段的事情。毛泽东虽然还继续听各部委的汇报，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苏共二十大上，从3月13日到4月11日的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²⁰毛泽东主持搞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中共最初“以苏为鉴”的代表作。

毛泽东听汇报后期的活动比较多。毛泽东从4月18日连续7天参观了在中南海瀛台举办的机械工业展，补充了他对现代工业的感性认识。与越南、印尼等国的兄弟党领导人交流意见；接见苏联政府代表团，谈经济援助的问题；与丹麦大使谈话表示“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的开放态度等。听汇报的关注重点，也更多地放到了统筹兼顾的综合性问题上。议论的内容也由经济问题扩大到政治和文化的方面。由此，毛泽东听汇报的为中共八大做准备的主题，在苏共二十大的启发下，扩展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些基本问题的全面思考，更具有了开放性的世界视野。这是形成“十大关系”的历史机缘。

人民银行4月11日的汇报是35个部门的最后一个，然后是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二五”计划的汇报内容具有综合规划性质，便于毛泽东联系前面的情况进行归纳总结。从4月18日起，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议论，开始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归纳。4月19日，毛泽东归纳出了搞好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4月20日，他在听汇报时又说了五个关系：轻工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557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80页。

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4月24日，毛泽东进而又归纳出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经济与国防、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六大关系。他说，斯大林在第四条上犯错误，东欧国家在第一条上犯错误。4月25日，毛泽东在前述六条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四条政治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国际关系）。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主题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报告。²¹

上述这个形成与发表的日程表，反映了“十大关系”提出的“急就章”特点。毛泽东在听“二五”计划汇报时，从三条、五条、六条到十条，从经济关系扩大到政治关系，是不断地“凑”出来的。从酝酿和提出的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星期，没有详细论证和充分讨论的时间。包括毛泽东4月25日在省市委书记会上发表“十大关系”报告，同样也是非常即兴。

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农业合作社问题，会期4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离开原议题，自拟提纲讲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这是最原始的“十大关系”报告。会议立即转为了讨论毛的报告。由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具有重大意义，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这次会议的规格被升级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由于毛泽东发表“十大关系”的报告很突然，中央办公厅没有安排录音和速记，事后亡羊补牢，根据几位与会者笔记整理出了一份记录稿。但毛泽东对这份整理记录稿很不满意。²²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题目下，再次做了“十大关系”的报告，并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5月2日的报告经过大幅度地修改补充，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如关于生物学家胡先骕批评苏联李森科学派的问题、关于地方分权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80—48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562、563、566、567页。

22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31页。

问题等等。5月2日的报告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内容充实，语言生动，是以后整理《论十大关系》的基础文本。实际上，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人们都是以这个报告为《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时间的。据现有材料，首先把《论十大关系》提出时间确定在4月省市书记会议上，是康生1957年3月13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²³而毛泽东是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才确定的这个时间点。²⁴这是要突出强调“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的前瞻性的需要。

毛泽东形成和提出“十大关系”的随机性特点，则是对应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提问题的直接反应，表现了它的“以苏为鉴”的最初思考特点。尤其是“十大关系”在六大经济关系上又增添的四大政治关系，明显是鉴于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惨痛教训。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的问题，显然激发了毛泽东的“弯道超车”意识。他认为中共有“群众路线”的传统，反教条主义的经验，可以避免出现苏共的错误。他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²⁵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识这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事情，对苏共是纠正错误的问题，对中共则是破除迷信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讲：“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²⁶。但是，对“十大关系”的指导性意义，毛泽东也没有确实的把握。直到两年后的成都会议上，他还说：《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5年。²⁷

23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二），1979年3月，第10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311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6页。

26 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353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325页。

毛泽东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稿，是研究《论十大关系》思想起源的关键性史料，然而迄今没有公开。但从其形成过程和内部讲话的特点来看，这个讲话是随意谈论的，没有正式报告严整的逻辑性。在文革群众组织编辑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简称毛万岁版）中，有篇目为毛泽东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的文章。²⁸这篇发言讲话记录，虽然内容凌乱，次序不清，字语简略，但讲话主题明确，语言风格一致，估计是来自某位与会者的原始笔记。大致可以对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基本貌像窥见一斑。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主要谈了下列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1、党内民主问题。针对的是高饶事件造成了党内生活紧张。讲：七届四中全会反高、饶是对的，后遗症是党内空气有些沉闷。不要搞得谨小慎微；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针对的是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这是重点部分。讲：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地方要分权，中央未做决定的，地方均可讲，可以自己搞条例。地方有权抵制中央各部不合实际的命令、指示。但此权只给省、市委（政治上比较成熟），不给地、县委；

3、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问题。针对的是农民抱怨最大的农业合作社的分配问题。讲：在个人与集体、国家的收入分配比例上，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社员，国家和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

4、经济体制的问题。针对的是苏联一长制体制。讲：一长制是军事观点，企业不采取苏联的一长制，实行党委制的领导；

5、中共八大问题。针对的是八大的制定党章问题。讲：党章要体现纪律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中央委员会可以考虑实行常任代表制，五年一任，加强监督；

6、“双百方针”的问题。针对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萧杀状况。讲：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成为我

28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5卷本，编者不详，出版时间1968年，第3卷，第99页。

们的方针；

7、开展经济调研的问题。针对的是中央对经济工作不摸底的情况。讲：我们是知道又不知道。今明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每个省、市都要汇报，搞些典型。

8、肃反问题。针对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讲：民主党派与我们在肃反等问题上有分歧。镇压反革命要肯定，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人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反革命是少了，但还有反革命，在机关学校还要继续清理；

9、全国一盘棋的问题。针对的是地方各自为政的情况。讲：全国的平衡是需要的，有全国的平衡，才有地方的部分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工业化搞不起来。

10、党内处分问题。针对的是这几年处理基层干部过多的情况。讲：县、区、乡干部处分过多过重，除反革命外都要给以改正机会；

11、少数民族问题。针对的是边疆省份镇压少数民族叛乱的情况。讲：李井泉说四川（对过度镇压）已做了纠正，各地也要注意；

12、国际关系问题。针对的是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讲：对苏联经验不要盲从，苏联已批评的事情，有些是我们已有了经验，有些在我国和苏联都不适用。还说“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对任何小国一律要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不要翘尾巴。

在这篇讲话记录中，关于苏联的垂直领导（中央集权）的教训总结，主要有：肃反扩大化、一长制问题，群众路线是恩赐观点、积累资金办法的剪刀差和征税政策不当等等。同时又说：还是“值得学习的多”，但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他生动形象地比喻说：“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这是最典型的毛泽东语言风格。

在该讲话记录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批斯大林的肯定态度。文中说：“斯大林、第三国际作的坏事可以传达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写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上是为了照顾大局，不准备在报纸和群众中讲。”

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文本“束之高阁”的情况下，比较贴近原稿精神的应是其他领导人即时的传达学习报告。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做了“十大关系”的报告，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人士外，还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110多人。毛泽东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会后，有人问毛泽东，能否传达。毛说：“可以传达给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无党派民主人士怎么传达，你们去想吧。或者分为几个集团，或一个人一个集团。几个朋友也是一个集团。”毛泽东此时的轻松自信，由此可见。《论十大关系》与国务院的工作联系最紧密。周恩来行动最快，在国务院率先做了传达。

5月3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在“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题目下，结合政府工作讲解了“十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工作部署。

在阐释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时，周恩来指出：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一般地说，这个方针是执行得比较好的。但还需要农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还说：苏联对农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使农业发展不大。东欧国家对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也有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训，应很早注意。”当前根据目前世界局势，世界战争“有推迟而且避免的可能”。因此，我们既“不应忽视准备，但也不要过分地受杜勒斯的恐吓，造成被动”。而应该很好地利用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增长人才，提高技术。²⁹周恩来还阐述了要保障个人利益、给地方放权、反对大汉族主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等政策观点，特别还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面”的这类“反动言论”。这些新鲜观点，明显来自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的启发。

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周恩来表达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意思，“苏联经验有些很好的应该继续学习，但是不能统统照抄”。周恩来特别强调了“十大关系”提出的意义重大，它的形成“也正是我们三十年革命经验和六七年建设与改造的经验的总结，也是有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71、572页。

鉴于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取得的经验教训。”³⁰这两个“也”的“十大关系”形成说，是“以苏为鉴”的最初表达。

周恩来的传达报告，结合政府各项工作的部署，把“十大关系”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披露了许多内部掌握的情况，如镇反和肃反的方针和杀、关、管的数字等等。周恩来说：这十个方针，现在还是初步意见，允许大家讨论，还不搞文件。现在，在地方传达到县；中央部门传达到司局。准备用两个月时间和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好好研究一下。周恩来强调学习“十大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工作对召开八大有帮助，对搞计划经济有帮助，对政府工作也会有改进。³¹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是最早下发的《论十大关系》传达文本。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政策相关性，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苏联方面。1956年8月22日，苏联驻中国代办利哈乔夫给苏共中央报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并与苏共二十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比对。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一份非常重要的珍贵史料。³²

利哈乔夫的报告，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原初报告的内容信息，披露了许多不公开的保密数字和人名，不仅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性，还结合《论十大关系》报告内容分析了中国政府许多新的政策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以外部世界的眼光对“十大关系”进行政策评估的，许多观点别有见地。这就为研究《论十大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参照系。其评估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治评价；二是对“十大关系”进行的逐条分析。

30 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节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周恩来传达“十大关系”报告有3万多字。该期所刊登的报告，回避了一些敏感内容，只刊登了其中四条关系。即：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

31 《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的记录——1956年5月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上》（本记录未经总理核阅），1956年5月3日下午三时。

32 沈志华主编：《俄国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318-325页。

第一，对“十大关系”的高度评价与政治定位

利加乔夫报告把“十大关系”称之为“十项原则”或“十项方针”，内容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报告对毛泽东的“十大关系”非常重视，认为“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

关于“十大关系”出台的政策背景，报告认为，是要巩固用激进方式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十项方针是巩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涨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的特别纲领，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

报告认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是一致的：“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第二，对“十大关系”的逐条分析解读

1、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认为：毛泽东加强轻工业的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但又指出：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中国不仅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落后。报告比较了中国与苏联在同一时期的重工业投资占比。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的重工业投资比重计划是87.5%，也比苏联同期要高。

2、关于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力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发展新工业区的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的指示，利加乔夫报告评论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中国一五计划的前三年，沿海工业发展速度呈现滞后。报告还说，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70%工业，二是注意到了原子弹带来的战争形态的变化。毛的讲话

中引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报告披露：现在中国已限制把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3、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认为，国家预算给国防拨款问题依然很高。二五计划中要给经济建设更多资金。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³³，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方已有裁减兵员和减少武器进口的打算。

4、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要求“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报告披露了民众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在1954年和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情况。中国政府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报告还说：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提出，显然是考虑到了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5、关于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要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报告同时又说：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6、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指示发表评论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民族政策还有严重的错误。一些地区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1956年，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西藏、新疆，在少数民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有的多达几千人。中央政府对民族政策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派出了7个民族政策检查组到各地检

33 这个军费数字显然偏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485页讲，“一五”期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24%。再加上行政费用的8%。中国在“一五”时期的军政费占到国家预算的32%。周恩来1956年5月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上说，“二五”时期的军政费要降到国家预算的20%以下。

查，大幅度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拨款。

7、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在论证这一原则时，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的“反对派”意义，能够了解“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报告评论说：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的危害。各民主党派本身非常薄弱，总共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5万人。根本不能与拥有900万党员的共产党相提并论。“现在的民主党按其实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像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有明显的政治好处。通过“安抚”这一阶层，可以强化他们对中共的依赖性。

8、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示减轻对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正当的。根据是：1951年的镇反运动，监禁130万人，处决71万人，监管120万人。1955年肃反运动以来，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前3个月共逮捕和判刑几十万反革命分子。还监管了更大一批破坏分子。1955年处决12500个反革命分子。在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里进行的干部审查。到1956年初，共审查400万人。到1956年4月，大部分破坏分子已无力反抗。取消死刑的方针将进一步瓦解反革命。

9、关于开展批评的原则问题。³⁴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批评了对上级唯唯诺诺，不能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现象。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的缺点。在这场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一反过去的传统，对国家机关的缺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中共不久前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报告还指出了不足：来自下面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

10、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

34 即《论十大关系》的第九个关系“是非关系”。

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还说一党制有阴暗面，必须学习某些西方国家的两党制。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报告特别指出：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国情特点。毛泽东为此告诫干部们说，不要骄傲，也不要妄自菲薄。

利加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评估，虽然有些主观臆断的地方，如对毛泽东急于求成的赶超心态估计不足。但整体把握比较准确，理解比较到位，有相当积极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到“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密切关联性，反映了中共高层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初起时的蓬勃气象。

上述可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对斯大林内政外交政策的批判，不仅让中共有了“以苏为鉴”的觉悟，而且苏共二十大在非斯大林化基础提出的新的政策方针，也为中共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新的借鉴模板。这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原始稿本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报告，中央高层的政策动向来看，至少在1956年“波匈事件”³⁵之前，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映，都是非常正面的、相当积极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论十大关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思想资源来看，它既是“以苏为鉴”的，同时也是“以苏为师”的。中心点是能不能走出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从这方面讲，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和反省还是很有限的，它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暴戾和个人迷信，但并没有认识到造成斯大林现象的制度原因，经济上仍然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³⁶但即使是这样，苏共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和震动，苏共中央是始料未及的。

列宁主义 - 斯大林体制是一党专政的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政治全能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搞领袖独裁，实行政党一元化的社会控制，依靠警察暴力实行专政，完全垄断了社会权力；在经济上搞强

35 即1956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事件，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

36 对苏共二十大的专题研究，可参见柳植的论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57-916页。

迫农业集体化，加速重工业化，采取无视民生的高积累经济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文化上搞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国家全面垄断信息和文化资源，实行强化灌输的政治教育，控制全体人民的思想言行。当苏联红军用坦克和刺刀把这个极权体制强加给东欧诸国，东欧诸国的民众是不接受的，反抗苏联控制的举动一直络绎不绝。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的冲击波，立即在怨气深重的东欧地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行动起来的是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6月，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机车车辆厂工人罢工，并走上街头抗议，反对共产党政府。政府当局调遣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造成至少74人死亡，800人受伤。1956年10月，匈牙利又发生了激烈的反苏行动。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新政府要求脱离苏联的控制，实行国家的彻底民主化，走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后苏联派重兵侵入匈牙利，用坦克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匈牙利方面有2700多人死亡，13000多人受伤。纳吉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被诱出并处死。现在的匈牙利史书称这个事件是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起义”。³⁷在处理波匈事件中，中共中央站在维护苏共的立场上，出面协调苏共与波兰党的关系，在苏联是否出兵匈牙利犹豫不决时，表态坚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

波匈事件的发生，让各国共产党人在非斯大林化的问题上发生了新变化。苏中两党的立场又趋于了保守。中共对波匈事件的总结，一是刘少奇从经济上讲的，搞重工业丢了人民；一是毛泽东从政治上讲的，没有搞好阶级斗争。毛泽东是革命暴力论者，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箴言，在列宁 - 斯大林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夺权革命的成功。他对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一开始就有“捅娄子”的担心，而波匈事件的发生，证实了他的担心。毛泽东认为这是苏共二十大捅出的娄子，把维护斯大林的威望与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两把刀子”说。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做总结讲话。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

37 参见百度百科对于“匈牙利十月事件”的解释，网址：<https://baike.so.com/doc/4488638-4697848.html>。

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³⁸

一向特行独立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看到了斯大林问题的体制原因。11月11日，铁托在著名的普拉演说中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铁托的认识要比中苏领导人从个人角度认识斯大林问题更深刻也更本质。匈牙利事件后，南斯拉夫与苏联刚开始缓和的关系又再度恶化。

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坚信暴力专政对巩固政权的决定作用。他亲自指导中共写作班子撰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以补充前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专政强调的不足。《再论》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肃反和对外关系上。强调斯大林功大于过，错误是第二位的。全面否定斯大林，就会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并首次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解释事件发生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再论》明批南共联盟，暗批苏共二十大路线。³⁹给国际共运归纳了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五条制度经验：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夺权；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化；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国际主义原则。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再论》认为制度不是万能的，好制度也不能避免犯错误，

38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606、607页。

39 《康生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1957年3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二），1979年3月，第7页。

还要有正确的政策、方法和工作作风。所以，“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而是他的思想方法陷入了主观主义，迷信个人权威，脱离了群众和集体，损害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再论》以道路曲折错误“难免论”和目标伟大前途“光明论”鼓舞世界共产党人。它说：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固然还有许多困难和弱点，问题在于未来，“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⁴⁰

《再论》是中共给苏共的雪中送炭，在它们最困难时期给予了坚定支持，有些话是苏共不便自己讲的。赫鲁晓夫对此深表感谢。⁴¹ 苏联《真理报》立即全文转载，还发行了小册子。东欧各国也都纷纷转载。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声誉大增。但更重要的是，《再论》中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社会主义五条制度经验，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判断，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法等等，成为了毛泽东“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把斯大林问题的实质，从制度层面降到了政策、方法、作风层面，这不仅妨碍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思考，还有了扬长避短的优势。中共反“教条主义”的变通能力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可以把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发扬光大的。或许也可以认为，这是毛泽东以后的国际共运扛旗意识的滥觞所出。

中共在患难时期的鼎力相助，使苏中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期，赫鲁晓夫对中国工业化建设上的支持力度是斯大林时期不可比拟的。但老师出了错误，学生的学习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已有了可以“后来者居上”的赶超意识。中共此后再说起的“以苏为鉴”，既有对斯大林错误的“为鉴”，主要是经济上的；也有对赫鲁晓夫“矫枉过正”的“为鉴”，主要是政治上的。随着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不断发展，后者“为鉴”的分量也越来越重。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讲，他对苏共批斯大林的心态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忧的是“一棍子打死”的否定“个人崇拜”。由此他提出了

40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41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4页。

两种个人崇拜说：对正确的个人崇拜，对马、恩、列、斯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⁴²这是毛泽东从维护领袖权威的角度给“以苏为鉴”增添的新政治内容。在经济政策上，毛泽东是在要重工业的前提下，兼顾人民生活。实际上，在工业化赶超战略的统制经济下，这个主次比例是很难把握的。在大跃进中，这个“兼顾”又给压缩到“糊口”的程度，比斯大林走的还要远。

毛泽东这些后见之明的观点与《论十大关系》原始版本的思想观点有很大出入，但却成为了后来者居上的官方主流叙述。毛泽东在波匈事件后说的一些话，还衍入了《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过程中，成为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上的语言文字。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3.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4. 卿文辉、崔海智、周益跃译：《毛泽东传》亚历山大·潘佐夫（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 沈志华主编：《俄国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
6. 邱巍：《〈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7.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8.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转载《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42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310-312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12. 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
1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4.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15.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二），北京：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1979年3月。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17.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 编者不详：《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5卷本第3卷，1968年。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20. 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节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21. 《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的记录——1956年5月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上》（本记录未经总理核阅），1956年5月3日下午三时。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23. 柳植：〈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4. 百度百科对于“匈牙利十月事件”的解释，网址：<https://baike.so.com/doc/4488638-4697848.html>。
25. 《康生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1957年3月4日。
26.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27.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